

多樣農作物種植，自新石器時期始，此地先民便兼營水田農業與旱地農業。秦帝國勢力擴張至此地後，便積極致力於促進地方農業生產，作者意圖探索自然環境、地方農作傳統，與由國家組織且受勞役驅動的農業模式是如何相互連結，並塑造地方農業發展狀態的。同時，本章也探討了官方在採礦與冶金方面的投資，以及中央的進貢需求對地方探索自然環境與動植物資源所提供的動力，這些發展都改變了地方傳統經濟的面貌。

第七章回溯了長江以南區域在秦所代表的中華帝國勢力短暫退出之後，呈現的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發展軌跡。作者認為儘管漢帝國在初期實施「郡國並行制」，使地方諸侯王國享有較大的自治權力，但南方邊地仍處於漢帝國的經濟文化影響範圍之中，且其日益接納並採用秦漢帝國一脈相承的行政體系與財政、軍事等方面的統治策略，這為此後漢帝國對邊地的整合鋪平了道路。尤其是在七國之亂後，地方侯國權力被持續削弱，至東漢時，中央甚少干預南方邊郡的狀況已被積極的地方管控所取代。作者又分析了東亞南部地區在此進程中於鐵器冶鑄技術、人口、城市生活、喪葬禮儀等方面的

區域交互，促進了漢帝國內部物質文化的標準化。

第八章從「世界體系理論」出發，但作者並未將秦漢帝國網絡視為受控於單一政治核心的「世界帝國」，而是運用此模型中的「半邊緣」概念來理解東亞南部在與早期中華帝國互動中的角色，以及其與在西漢時期逐漸成為東亞「核心」的關中、中原地區的關係。作者指出，東亞南部靈活地抉擇於「帝國網絡」與「非帝國網絡」等交互關係之間，並不絕對依賴於「核心」。這也致使在東亞核心於六朝時期因政治力量消長而缺乏穩定之時，東亞南部能夠對核心的重構過程發揮顯著影響。最終，此過程使東亞南部在唐宋變革之際擺脫「帝國邊地」的邊陲身分，逐漸成為中華世界經濟文化的心臟地帶。

本書透過引進「帝國網絡」概念，借助豐富的出土材料，回溯東亞南部區域內外的交互活動，重新審視中華帝國在長江以南的擴張進程。這一將帝國形成史觀與世界體系模型運用於上古中國的創新，為東亞歷史、戰國秦漢史研究帶來嶄新的框架與思路。（羅棋布，澳門大學歷史系大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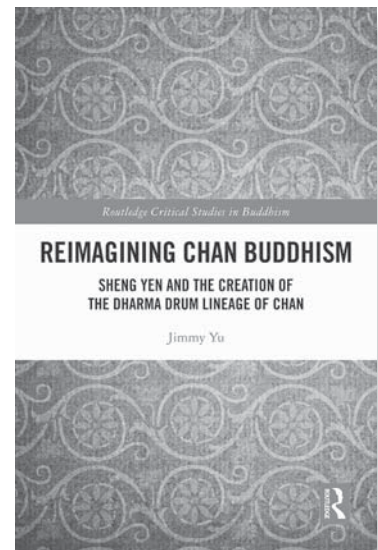
## *Reimagining Chan Buddhism: Sheng Ye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Dharma Drum Lineage of Chan*

Jimmy Yu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226 pages, ISBN 978-103-2051-68-0

本書作者俞永峯（Jimmy Yu）為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宗教學系聖嚴中國佛學教授。俞教授曾在 2016 年



獲得漢學研究中心獎助來臺，並以「承先啓後的正統漢傳佛教——聖嚴法師的中華禪法鼓宗」為主題發表研究成果。釋聖嚴（1931-2009）是臺灣近代宗教史上最具有影響力，且廣受尊敬的人物之一。聖嚴的大力推動對禪宗在臺灣與美國兩地的流布，有極深遠的影響。他同時也善於將意味悠長的佛典教義，以普羅大眾慣用的詞彙文字表達。他創設的法鼓宗梳理漢傳佛教的傳統禪法，並參考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的禪修方式，形成臺灣佛教風格的宗派，迄今法鼓山仍與慈濟、佛光山、中台山並稱為臺灣佛教信仰的四大山頭之一。

本書除引論與結論外共有四個章節，每一章節探討聖嚴與他所建立中華法鼓禪宗的一個面向。第一章介紹聖嚴的生平。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局勢的動盪，磨練出聖嚴對自身環境的「危機感」。本章特別介紹造就他生命歷程重大轉折的抉擇的歷史偶然性。如中共取得政權使他喪失僧侶身分，加入國府志願青年軍遷來臺灣；直至1959年才在多方協助下，還俗並於東初禪師（1908-77）門下再度出家。因為年輕時在戰亂中欠缺求學機會，間接引發聖嚴日後對鑽研佛教教理的學習慾望。在高雄山中閉關六年時，聖嚴讀畢所有釋太虛（1890-1947）的著作，培養觀想的諸種方法。之後前往日本求學，成為漢傳佛教首位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的出家僧侶。本章以聖嚴提倡「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願景做為結尾。

第二章主題是聖嚴以推廣禪宗佛教，重建並整合臺灣漢傳佛教的體制，建立「中華禪法鼓宗」的傳承歷程。聖嚴的目的之一是為後世保留民族中心主義的漢傳佛教。本章亦有討論他對「漢傳」一詞的定義，作者認為聖嚴的「宗」並不能單循佛教典籍如「語錄」、或禪宗語要如「燈錄」的角度詮釋。聖嚴的「宗」偏向「宗旨」，讓他能站在正信的立場護持臺灣佛教，以對抗非漢傳佛教的勢力。作者將著名美國政治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用以形容國家的「想像的共同體」借用在法鼓宗的概念上，指出它是一種制度化的想像社群。藉由建立法鼓宗的過程，聖嚴也對臺灣社會的問題、沉痾做出回應。身為曹洞宗與臨濟宗法嗣的聖嚴，終於有機會實踐太虛無法辦到的，整合漢傳佛

教並制度化。此舉明顯地將法鼓宗與其他大型佛教團體劃分開來，並且透過直觀的禪宗實踐教育，讓法鼓宗也建立自我風格的社會參與形式。

第三章自1980年代起至1990年代後期，伴隨臺灣經濟起飛的，是密教、藏傳佛教等信仰派系的大舉傳入，相當數量的臺灣民眾改宗皈依藏傳佛教，加上臺灣本土民間信仰的興盛。面對勸誘改宗的挑戰，聖嚴於1998年在紐約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晤談的前夕，發表了「判教圖」，判教是中國佛教徒用來整理排呈諸多佛法教理的體系。聖嚴綜合天台宗與華嚴宗的教義脈絡，以及它們與禪宗的整合。嘗試從以往「站在正信佛教詮釋禪佛教」，轉為「站在禪佛教的立場來綜合整體的佛教」。判教圖對聖嚴自身亦有啟發的作用，糾正了他過去在西方所見的，將禪宗視為一種反律法（antinomianism）、與佛教相悖的流派的誤解。

第四章聚焦於判教圖的後半部，禪宗佛教的實踐與體驗。本章檢視聖嚴提出的針對不同修行者的禪修法門，以及這些法門如何延伸至當時臺灣社會各領域所面對的問題。最多篇幅用以說明聖嚴的三大入門方便：「離心意識即能實證佛性，真如實相，親見佛的三身」、「以妄遣妄，放鬆身心修兩種法」、「散心安心修無礙行」。也探討聖嚴對悟道與實踐、智慧與煩惱、頓教（suddenism）與漸教（gradualism）等明顯的悖論之間的協調。聖嚴認為覺悟是內在的，但使信眾便於修行的「方便法門」仍有存在的必要。禪修無須像早期印度佛教救世思想一般德行無瑕，可以循序漸進地棄絕煩惱，提升對成佛的願想。

俞教授在結論部分總結前四章對聖嚴與其禪宗法脈的研究所得，並根據臺灣法鼓山僧團，與聖嚴在歐美等國家的弟子，提出法鼓宗在聖嚴辭世後遭遇的挑戰與未來的願景。無論聖嚴或法鼓宗，皆與臺灣社會有著緊密的聯繫，他的戒律、法門、學說甚至人生觀以書籍、紀錄片或研討會等方式持續流布。本書是首次以英語撰寫，從社會知識史的角度切入，分析聖嚴與法鼓宗的著作。俞教授前來漢學中心訪學時，曾就聖嚴創立法鼓宗的背景有過初步的探討，他的研究成果則悉數呈現於此作品。從聖嚴的傳記為起點，引領出對社會、政治環境

的關懷，進一步連結到二十世紀中國和臺灣的宗教史。與美國天主教大學 Charles B. Jones 教授的 *Taixu'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re Land in the Human Realm":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Bloomsbury, 2021.1) 悉為近年以華人佛教界著名僧侶為主題的重要著作。(洪俊豪，輔仁大學歷史系碩士)

## 中国注疏講義 經書の卷

古勝隆一

京都：法藏館，2022

264 頁，ISBN 978-483-1877-58-1

本書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古勝隆一的最新著作。作者曾出版過《中國中古的學術》(研文出版)、《目錄學的誕生》(臨川書店)、《漢唐注疏寫本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古中國的學術與社會》(法藏館)等論文集或專題研究，而本書是他的第一部面向初學者的入門普及著作。

寫作緣起於作者在東京大學求學時的心得。他在注釋、翻譯漢文文獻的過程中認識到，理解中國經文涵義的根本在於閱讀古人的注疏，而僅僅查找現代辭書是不夠的。在此後的研究中，他受惠於大量的經典注疏，進一步認識到注疏在經典閱讀中的媒介作用，同時感受到很多學生很難遇見可以教授閱讀注疏的老師，於是結合自己在京都大學的教學經驗，寫作此書。

本書分為「基本篇」和「讀解篇」兩部分。「基本篇」為中國經書基本情況的概述。選取注釋、小學、辭書為切入點，指點獨立閱讀經書的門徑。第一講「古典」介紹中國古典的定義，確定本書以其中的經書為主軸；第二講「注釋」指出經書注釋存在的意義，以及前漢的「傳」「記」、後漢以來的「注」「疏」的形成過程；

第三講「《十三經注疏》的概要」獨具一格地把《十三

經注疏》分為經——傳——注——義疏——音義五個層次，列出了清晰的一覽表，指出阮元校勘本的體例格式和版本問題，並推薦了近年出版的整理本；第四講「字形」、第五講「字音」、第六講「字義」分別簡述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的發展歷程，並推薦了《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廣韻》、《爾雅》等書的實用版本；第七講「辭書」介紹《經籍纂詁》、《故訓匯纂》作為「最小限度的訓詁書」的意義，以及可以配套使用的現代辭書；第八講「句讀・文法」用實際例證說明句讀位置的差異，會導致文理解的偏差，在此基礎上介紹了適合日本學生自學的漢文法教科書。

在「讀解篇」中，古勝教授以豐富的例證，示範通過注疏閱讀經書的方法。日本各大學的文科授課一般可以分為兩類：講義和演習。前者是教師單向輸出知識；後者是學生注釋、翻譯被分配到的文獻，在課堂上報

